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群众运动—— 对运动参与者的考察分析*

The Problems and Governance of the Mass Move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Movement

韦博**
(WEI Bo)

摘要

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素以组织动员见长的中国共产党发挥其执政党的政治优势，进一步广泛组织开展群众运动，以实现国家治理。但群众运动的热潮连带产生诸多负面效果，狂热的群众运动现场背后存在截然不同的心理面相。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均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试图进行相应整治。对群众运动的动员与整治集中体现了建国初期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治理策略。

关键词：群众运动、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

Abstract

The mass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seize power and build the count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has always been known for organizing and mobilizing the masses, gave full play to the political advantages of being the ruling party. The Party therefore further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mass movements to achieve nation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upsurge of mass movements has produced many negative effects, and there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aspects behind the frenetic mass movement scenes. Both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aware of the problem's existence and are attempting to rectify it accordingly. The mobiliz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mass movement embodies

* 本文对“建国初期”的时间范围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1月1日中共正式发动三反运动之前，在此特作说明。

** 韦博 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425702709@qq.com

the governance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ruling organiz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mass movement, national governance, CPC, the early days of PRC

前言

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的重要手段。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高举群众路线旗帜，积极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动员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荣升为执政党，得以在没有国家权力限制的情况下开展群众运动，这一前所未有的政治优势以及以前丰富的运动经验使得中共在建国初期的国家治理中对群众运动相当信赖。这种运动往往能够快速高效地面向全社会推广国家意志，但毋庸讳言的是也产生出一些负面效果。那么，群众运动所产生的问题到底有哪些？中共又是如何回应的？考虑到群众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共常态化的治理手段，这些问题对于理解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学界对建国后群众运动的研究多以特定的运动个案为主¹，缺乏总体上的观照和把握。因此本文希望超出个案范畴，利用不同运动参与者所记录的对各种社会运动的主观感受，观察和概括建国初期群众运动所存在的普遍心态问题，以便重新审视群众运动现场狂热气氛背后的不同面相，进而考察中共对于群众运动的引导和调整，以此探究中共初为执政党时的治理策略及其得失。

一、建国后群众运动的盛况

群众运动的兴起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1921年正式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难免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共是仿照苏俄而建立的新式政党，后者以及共产国际一向特别强调群众动员，重视群众运动的作用。两相作用之下，群众运动成为中共在革命年代进行革命动员以夺取政权的重要策略，在惯性力量之下，这一策略在建国初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得以延续。

早期中共党员大多出身书斋，其群众动员能力并非一蹴而就。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期间，时任政治书记的卡尔·拉狄克（Karl Berngardovich Radek）就曾对中国共产党薄弱的群众基础提出了严苛的批评。他对中国同志说：“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在广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1981）其后，中共不断尝试进行群众动员，陆续组织开展各项群众运动。其中最为成功的

¹ 相关研究参见李智星，2020，〈新中国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和人民主体——以北京市历史档案为基础进行分析〉，《东方学刊》，第4期，页94-105；章林、梁尚华，2020，〈从《人民日报》看中医药领域群众卫生运动——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核心的述论〉，《中医药文化》，第6期，页73-82；刘春梅，2020，〈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卫生治理运动的多重效应〉，《继续医学教育》，第10期，页64-66，等等。

当属五卅运动。正如共产国际在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的《觉醒的中国》一文所称：“一个还没有足够斗争经验的党能够提出完全正确的口号，从而一下子就抓住了群众，并把运动提到完全正确的水平，这一切是令人惊讶的。”（杜文焕、刘德喜，1991）此后的革命岁月，中共的群众运动固然时而出现过激、过左等问题，但对夺取国家政权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入主北京后，面临的最大一道考题便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以完成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这中间，中共仍对此前的群众运动手段抱有相当信任，力图通过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等形式的群众运动推动党的意图和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执行。

得益于执政党地位，此时期的中共能够较为从容地为群众运动设立相对规范的程序以便实现把控。以1949年10月1日上海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暨保卫世界和平”游行为例，在中央政府的总体指示下，先由上海市各区、各单位及其所属基层组织在群众中展开深入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登记详细信息，派人同各行政区的庆祝国庆纪念筹备委员会区分会报导领取报到证。在游行当天，动员组织群众在跑马厅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一般要悬挂大幅标语，各机关派代表参加大会以检阅游行队伍。大会程序如下：1. 鸣礼炮；2. 唱国际歌；3. 唱代国歌；4. 检阅；5. 下午二时放和平鸽；6. 下午四时放气球；7. 下午六时放照明弹；8. 下午八时放发光子弹；9. 下午十时放焰火。（《新民报晚刊》，1949）大会结束后，全市游行队伍分为三路，依次穿过会场，进行分区游行。上述程序无疑有着很强的仪式化特征。

抱着对新国家政权的无限期许，建国后的群众运动往往充满了热情和欢乐的气氛，成为群众的一种情感宣泄方式。以1949年10月1日上海的国庆活动为例，上海各界展现了极为高昂的热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内心的欢愉和激动。对于上海的工人来说，这是属于他们的狂欢时刻。在军工路的中华铅碱厂工人，坚持要参加游行；上海煤气公司工人，用废铁皮电焊连夜赶制出了最新式的火炬，沪东区浴室业工人在极度兴奋中，集体创造了火龙，准备在全市游行示威日以后，在街头表演；上海铁路职工学校四百余人冒雨在虹口北站游行宣传，出动了秧歌队、歌咏队，一面扭着、唱着，一面进行宣传，受到沿途市民的热烈欢迎。（《新民报晚刊》，1949）妇女界各团体已停止办公，正全力集中在筹备参加大游行的各项节目，缝制标语布告，糊紧灯笼，练习歌咏、秧歌并在民主妇联集合，排队演习，由妇女界筹备分会转达总会通告的应注意的各项事件。（《新民报晚刊》1949：4）工商界为扩大庆祝，决定再次举行工商界单独游行，邀请工商界全体同仁参加的同时，还集合三百辆大卡车，举行卡车大游行。（《新民报晚刊》，1949）而上海教育界的庆祝热忱也十分高涨，复旦、同济、交大、上法、暨大、高械等高校教职员均有代表参加上海市集中性的庆祝大会，高教联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二十余人，前往北四川路与虹口区各界代表集合后，冒雨步行前往市中心大会场开会。（《新民报晚刊》1949：1）尽管下雨使得路面湿滑，气候湿冷，但在上海各界参与热情的烘托下，呈现一片欢腾的气氛。

在这一片欢腾的历史性场面中，有一个背景很容易被读者乃至研究者忽略。实际上，尽管上海各界参与群众运动的情绪高昂，但恶劣的天气极大地阻碍了运动的顺利进行。从1949年9月29日开始，连续数日的降雨致使路面长时间积水，（《新民报晚

刊》，1949）多路电车因路上有积水而无法开出，被迫停驶，（《新民报晚报》，1949）各界辛苦赶做的灯彩与纸扎由于被雨淋坏，原定于10月4日午后举行的三轮车万余辆大游行被迫延期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大会筹备处对于人数的限制。10月4日，工商界参与游行的人数仅达3000人左右，（《新民报晚报》，1949）以此达到严格控制人数，维持游行秩序的目的。恶劣天气的持续，加之对于人数的严格限制，对群众运动的顺利进行影响颇大。

此后，上海市开始积极治理由恶劣天气引发的积水问题。自10月5日天气放晴以来，跑马厅积水一面自行清退，一面经打水机积极排水后，所有积水已不复存在，各街道积水也已逐渐消除，不少电车也已完全恢复行驶，（《新民报晚报》，1949）影响运动开展的恶劣天气已然消失。随后，上海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庆祝中国人民政协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备处决定扩大游行庆祝范围，发出通告：“兹为满足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及保卫世界和平的热烈要求，特将范围扩大，举行全市庆祝狂欢大游行，参加人数不予限制。”（《新民报晚报》，1949）

上海各界想方设法吸引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群众运动。工商联在参与游行后，为扩大庆祝，特举行游艺会与聚餐会等，在聚餐会中还有摸彩赠送奖品等余兴节目。（《新民报晚报》，1949）另外，游行队伍对于游行宣传的节目亦精彩频出，沪东区职工积极准备的游行节目，如歌咏、活报、漫画、秧歌舞、龙灯锣鼓、广播车、火炬、鞭炮流星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新民报晚报》1949：4）不断吸引着群众的目光，调动着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人数限制的取消和游艺会、聚餐会、抽奖等精彩环节的吸引，群众的参与欲望愈发强烈，气氛日趋热烈。上海某市民于游行后，在其日记中写道：“不到八点，同事们都陆续地到齐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好像有着天大喜事似的。队排好了，我们出发游行去了。二百多人的队伍，也够雄壮了，我们在路上唱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保卫和平’歌，更扭秧歌舞，打莲湘，路旁的行人都立定了看我们的表演，尤其是小朋友们跳跳蹦蹦并欢呼着，这时候我们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尽的快乐。”（《新民报晚报》，1949）

10月7日，上海市各区人民大量涌上街头。沪南区与静安区的游行参与人数已达到2万人，沪东区参与大游行的人数达到了7到8万人（不包括北虹区及郊区），沪西区则达到了9到10万人，沪中区积极准备参加游行的人数更是达到了10万3千余人，较原有的4万5千人增加了一倍有余。（《新民报晚报》，1949）而10月8日时，人数再度增长。在大会筹备处的鼓励下，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由原先的20万逐日增加到了40万7千人（已向大会报导者）。由于群众过多，从当天中午12点起才开始进场。（《新民报晚报》，1949）到了10月9日，全市参与游行的群众规模更是达到了六百万。（《新民报晚报》，1949）

这种亢奋状态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得到延续。随着朝鲜战争的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呼声愈发强烈。1950年12月16日，上海工商界15万人隆重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示威大游行。东西南中四路游行队伍于上午10点30分在跑马厅会师，11点10分举行游行典礼。（上海档案馆，1950）当天天气严寒，游行队伍在游行过程中高声疾呼“要保家卫国，必须抗美援朝”。上海的摊贩们得知要开展大游行

时，都争先恐后地前往报名。黄浦区各个菜场的菜贩，很早便起来准备，原定6点的集合时间竟提前到了5点，老闸北区各地的摊贩也提早到排队处等候出发。（《大公报》，1950）黄浦区有不少摊贩在菜场售完菜蔬后，又特地赶去参加游行，原定一千五百人的游行队伍，到9点时又增加了五百多人，（《大公报》1950：2）这使得游行阵营更为壮大。

上述节庆游行案例集中反映了建国后的群众运动规模之浩大和氛围之高昂。这种群众运动一改现代中国衰朽颓丧的精神面貌，透露出国运转变的讯息。但随着群众运动的不断深入，各类负面问题也不断凸显。

二、群众运动的副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类群众集会和游行使得各阶层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日趋高涨，振奋了人心，提升了社会凝聚力。但是当运动达到一定的频率和强度，一些不良反应也随之出现。

首先，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过多，导致身体疲劳乃至健康状况恶化，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和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对于群众运动的参与程度，充分体现在参与频率和时间上。笔者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统计了吴宓从1951-1952年期间参与群众运动的情况。如下表：

表1：1951-1952年吴宓参与群众运动情况统计表

日期	参与的运动类型	起始时间	运动时长
1951年1月21日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参军学生欢送会	下午4: 00（吴宓到时，该会已开过半） - 5: 30	不少于3小时
1951年1月22日	重庆市第三区各界人民欢送参军同学大会	破晓 - 下午4: 00	不少于9小时
1951年2月15日	庆祝中苏条约一周年及反对美帝单独媾和武装日本游行大会	上午8: 30 - 下午3: 30	7小时
1951年2月20日	重庆市第三区人民庆祝中苏盟约周年，并反美与日本单独媾和武装日本大会	上午8: 00 - 11: 00 （吴宓未等到大会结束，已单独离开）	不少于3小时
1951年3月23日	公审特务、反革命分子大会	下午2: 00 - 6: 00	4小时
1951年4月11日	公审特务及反革命分子大会	下午1: 00 - 5: 00	4小时
1951年4月14日	镇压反革命控诉大会	下午5: 00 - 晚上11: 00	6小时
1951年4月24日	反对美帝单独媾和并重新武装日本投票大会及爱国公约大会	下午3: 00 - 7: 00	4小时
1951年4月26日	教职员学习委会及工筹会联合工作部成立会、外出宣传会	下午1: 30 - 4: 30； 下午4: 30 - 7: 00	5小时30分
1951年4月30日	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座谈会	晚上8: 00 - 1: 00	5小时

1951年5月1日	劳动节大游行	上午7:00 - 下午2:30	9小时 30分
1951年6月20日	西南师范学院师生员工大会	晚上8:00 - 12:00	4小时
1951年7月14日	重庆市第三区欢送二次学生参军大会	上午7:00 - 11:00	4小时
1951年10月1日	国庆大游行	上午6:30 - 下午6:30	12小时
1952年1月1日	公安展览会	凌晨3:00 - 6:00	3小时

* 笔者根据《吴宓日记》的内容编制而成，有部分会议未说明时间，因此并未列入。

由上表可知，建国初期的群众运动类型多样，有纯粹的游行大会，也有欢送会、公审会、宣传会、座谈会、展览会等活动形式。从1951年1月21日起，截至1952年1月1日，吴宓几乎每月都参与示威游行及宣传大会等群众运动，参与总次数约20次以上。参与的时间最早是凌晨3:00，最迟是晚上8点。耗时最短为3个小时，最长已到了12个小时，其参与群众运动的频率之高、耗时之久可见一斑。

在如此高频率、长耗时的群众运动下，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7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简称“西南局”）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发现，学校师生在频繁参与群众运动后，已经出现了较为混乱的情况。“不少学校在一学期中仅上课数周。县、区政府，公安派出所和其他机关都可以随便派学生的差事，如布置会场、当招待、演戏、填粮票、调查户籍、欢迎、欢送等。许多机关和人民团体都直接到学校中布置工作，往往有同一性质的会议和同一问题的报告，在学校中重复好几次。过多的会议与过多的社会活动，成为师生的重担，一个团员每周须参加十几次会议，一个积极分子常身兼十几件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西南局宣传部在1952年十月下旬对重庆綦江县的14个小学进行调查。据统计，该县桥河完小在本学期共进行宣传活动24次，内容有19种，每次宣传需要出动4个教师，缺2节课，以24次计算，从开学到第10周，已缺席了39天正课（每位教师每天以5节钟正课计算），使三分之一的教师（全校12个教师），缺席了65%的课程；村校情况更为严重，如该桥河乡普遍是1个教师教2班或2个教师教3班，各校约有学生50-60人，多者达130人，晚上要教农民识字班，在这种情况下，仍要参加各系统的活动；如水明村校，每逢三、六、九日参加干部会，四、七、十日参加居民会，每隔一天参加武装会，如果迟到了还要作检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由此可知，学校师生担负着超额的会议与社会活动任务，扰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对于群众运动的参与者来说，若运动频率过高、时间过长，还可能导致过度疲劳从而引发健康问题。1951年，在大学任教的吴宓在提及中提到五一游行前夕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召开的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座谈大会的情况：“十一小组逐次报告，并总结。词多冗长重复……宓喉痛，甚倦。今者众皆疲劳过度，无片刻休息。”（吴宓，2006）开会耗时过长，休息不足，身体已然十分疲惫，损害健康，甚至患病和死亡。吴宓感叹道：“近学生患肺病者日多，死亡相继，只缘劳疲过度耳。”（吴宓2006：33）

上海亦有类似情况。1949年10月，较长时间的运动导致了群众身体疲劳甚至死亡的情况出现。顾颉刚在其日记中写道：“闻日前游行队伍中，一中纺女工扮作和平之

神，游行时间太长，欲小便而不得，忍之又忍，及除伍解散，则已不能出溺，肾脏坏矣。送至医院，不救而死矣……复旦队伍在横滨桥待至六小时，及至跑马厅报到而回，则已半夜矣，因此同学多病，渠亦病。”（顾颉刚，2011）1950年8月1日，上海市为八一建军节纪念并为朝鲜问题发起了示威游行，历时十二小时之久，社会各界人士均有参与，人数多达十余万，而当天下起的大雨导致大多数参与者的衣物均被雨淋湿。（《新民报晚刊》，1950）对此，顾颉刚颇为担心，“此在解放军固无所谓，而上海市民不睡，不食，不饮，不撒十二小时，衣服湿了干，干了再湿，不知有多少人生病矣。”（顾颉刚 2011：667）

一则官方报告也注意到，1951年，武汉市委在妇女界抗美援朝的游行报告中指出，由于天气阴寒，对许多年老的妇女照顾不周，使得她们过于疲劳。（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在重庆，抗美援朝运动展开后，“自春节以来，市区内已形成一种几乎无日不示威游行的现象，动不动就发动群众游行”，重庆市委意识到：“这种频繁动员群众游行的现象，现在已是需要注意，并及时加以纠正了。游行太多了，必然耽误工作，妨害生产和学习，疲劳群众，使干部与群众都感到是一种负担。”（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中共华东局也在报告中认为，学校师生的会议多、社会活动多，结果弄得好学生成绩越来越差，进步的教员教学水平逐渐下降，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学生和教员的健康。其后，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在相关指示中认为：“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临时突击任务过多，学生中活动分子兼职过多，各种会议过多过长……使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过于紧张，身体过于疲劳，甚至严重地影响到学生的健康，因而也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学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毛泽东在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说道：“革命带来许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以毛泽东的语言风格，这句话可能略带调侃成分，但“疲劳”二字无疑是个事实。

疲劳和疾病的发生又会打乱民众学习和生活的步伐。在参加完1951年五一前夕召开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座谈大会后，吴宓明显感觉到睡眠严重不足，“学生因病辍学者多，而同人相视日益压瘦。”（吴宓 2006：126）1950年八一游行前夕，顾颉刚在与友人交谈后，在日记中提到：“善业来，谓明日游行，须于今夜十二时半到吕班路排班，既不能睡，又不能食。”（顾颉刚 2011：666）言语中颇多无奈。

实际上，频繁的群众运动不仅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在消磨他们参与运动的热情，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对此，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回忆：“进北京不久，当时正负责编辑《文艺报》的老朋友陈企霞，给我看两张漫画。一张是米谷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讽刺会议太多；另一张是高莽（现任《世界文学》主编）画的，批评我们内部的一些不良现象。”（杨力舟、郇宗远、中国美术馆，2001）苏联代表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来到中国时，对中国的批评就涉及到了开会太多以及开会时间太长等问题，（顾颉刚2011：540）而顾颉刚的友人在与其谈论时提到：“中学教员中本有前进者，去年学习时甚认真，但现在开会太多，亦流于形式主义，学习时甚多公开骂政府者。”（顾颉刚 2011：626）这表明已有不少人对过度的群众运动颇有怨言，甚至出

现了辱骂政府的情况。对此，顾颉刚也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不但要人钱，也要人时间，真受不了！”（顾颉刚 2011：586）

其次，部分民众过于热衷群众运动，相应忽视学业和工作。

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民众在参与过程中表现出了极为亢奋的精神状态。1951年5月27日，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重庆某高校师生举行的游行庆祝活动极度热烈，“到处锣鼓爆竹之声，而男女助教、学生复在本楼踏歌合唱，震楼板摇摇欲倾，半夜始散寂”。（吴宓 2006：142）这种运动狂热使得他们在学业和工作上有所懈怠，甚至达到了厌弃的地步。在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们不听从学校上课的指令，热衷于敲锣打鼓、群众运动的演习等事项，部分女生甚至全天都聚集在楼栋中唱歌跳舞。对此，吴宓痛心指出：“今校中已无人读书。姑不论中西文哲史之学，敢有劝学生用功英文、数、理、化者，亦将犯‘阻碍进步，破坏团结，反对参军，援助美帝’之嫌疑矣！”（吴宓 2006：38-39）其后，吴宓又在日记中对学生整日聚集游行，懈怠学习的情形有所说明：“早饭时，闻教职员膳堂即将移至楼上大厅……其上则学生日夜群聚之教室，蹴踏鼎沸。其外操场，终日学生练习体育，又为各种校内外游行队伍集合及公审枪决特务之地，锣鼓震天，人声汹涌”。（吴宓 2006：63-64）学生们早已将学业置诸脑后，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参与群众运动上。通过吴宓所作的诗，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到学生极度热衷于参与群众运动，不读书、不学习已成为常态。全诗如下：

《咏教育史》

斯巴达国古时雄，千载流风被亚东。
力拓霸图修武备，为储军食重农功。
半年只上三周课，博学何如一技工。
歌唱游行书勿读，鲜卑伏事语当通。

（吴宓 2006：94）

此种情况并非个例。上海震旦大学学生在上课时不仅精神状态极差，还出现了学生们多次以开会为由要求退课的情况，该校的学生代表大会更是因为要借地方开会而要求不上课。（顾颉刚 2011：631、642）学生参与群众运动的情绪已过于高昂，将学业完全抛诸脑后。而对于有工作的职员来说，参与群众运动似乎也成了主要任务。1949年10月2日，上海下起了大雨，八路电车上有两个售票员就曾游行不成而抱怨天气不好，并说道：“总不会落到十号，总有一天要游行”。（《新民报晚刊》，1949）学生和职工为参与群众运动已然完全放松了学习与工作，对于群众运动的回应与热衷已经到了近乎病态的地步。

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群众运动问题的两个对立面。对运动心存抵触的群众，可能更多注意到运动对自身学业、工作乃至健康问题的负面影响。在这个人群中，知识分子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吴宓和顾颉刚只是其中的代表。因其有日记传世，其当时情绪得以记录下来。另一方面，许多人将运动视为逃离学业和工作的良机，自然会表现得积极主动，但运动参与者的此种心态正好凸显了运动的实际效果问题。总之，狂热的群众运动背后实际上还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面相。

群众运动对参与者健康和事业的不良影响，涉及到的是群众运动策略何以为继和运动效果如何达成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中共的警觉。

三、中共的整治

建国后，针对群众运动中的事故，中共中央曾指出：“已经足够说明我们在组织大规模群众活动的工作中，存在着一种严重的麻痹大意的倾向……对于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故缺乏充分的估计和必要的准备，对于其他地方已经发生过的事故，不认真接受教训等等，便是连续造成这类事故的根本原因。”这一检讨具有很强的提示性。中共素来重视群众运动，但是从革命到建设，从根据地、解放区到整个中国，中共对群众运动的掌控毕竟还需要一个摸索过程。对于新生的中央政府来说，能否妥善处理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并实现引导便成了一个不小的挑战。

首先，针对群众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疲劳和疾病问题，从地方到中央都有相应考虑并提出应对措施。

1950年9月24日，上海市在筹备国庆游行过程中发出指示：“游行示威时，为使大队能够坚持，队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应通知每人最好能随身携带水壶（如用玻璃瓶装水放在口袋中）、干粮、简单药品。凡儿童及老年体弱者各单位应婉言劝阻，不要参加。”（上海档案馆，1950）若不是因为之前活动中遇到过突发事件，想必相关部门不会叮嘱得如此细致。

上海地方政府的这类考虑并非孤例。195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抗美援朝以及准备五一纪念活动的办法》中规定：“从现在起至四月下旬止，进行广泛的时事宣传，但群众性的活动应尽量集中于四月下旬，以免群众疲劳和妨碍生产；为使群众确实了解游行意义，在小城市和农村游行前，可举行短时间（不超过一小时）的大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这一规定表明中央政府充分了解运动中的群众疲劳等问题。毛泽东针对这个问题，还专门提出如下解决方案：“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

但是实际上中央的规定并未得到普遍执行，毛泽东的理想设计自然也很难实现。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央的三令五申。196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保障学校师生的身体健康作出指示：“必须控制各种社会活动和会议。学生参加各项集体的社会活动时间（包括会议、课外体育军训等活动时间在内），高等学校每周不得超过九小时，中等学校每周不得超过六小时。学生参加党、团和班系的会议活动，每周以两次为限。要改进开会方法，高等学校每次会议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中等学校每次会议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对于学校师生……必须切实保证他们每日有八小时的睡眠和适当的运动、娱乐等时间。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应当由他们自由支配。”（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

其后，针对不少城市并未认真执行上述规定而出现部分师生患水肿病及其他疾病的情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出台紧急通知，除限期治愈相关师生的疾病，加强疾病

的预防工作外，还作出以下规定：“在目前师生疾病较多、健康状况下降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适当地减少工作、学习、劳动的分量，增加一些睡眠和休息的时间。每周开会次数和每次开会时间要严加控制。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一律不开。要保证假日和大部分业余时间由师生自由支配，不得任意侵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中央要求不得“任意侵占”，恰恰折射了师生因会议过多而不能自由支配自己业余时间的事实。

其次，对民众过于热衷群众运动，懈怠学业和工作的情况，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进行过相应整治。

1951年4月，重庆市委针对出现的群众游行过多从而无法工作的现象，作出如下规定：第一，除全市性的群众示威游行外，各区各群众团体如需组织群众大会或游行时，必须经市委批准后方可动员；第二，一部分群众的示威游行，一般应以说服停止，如坚持游行，须经各区区委或市级群众团体的批准；第三，任何示威游行，在报请市委批准的同时，须报告市警备司令部，并接受其指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7月，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同时发布指示，规定：“学校中的一切工作均应以完成学校教育计划为基本任务；立即停止校外各机关、各人民团体擅自在校内单独布置工作，随意动员学生参加校外活动，以致形成多头领导，妨碍教育工作的混乱现象，除国家规定的假日外，各级学校均不得自由停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这两条材料，揭示了建国初群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许多群众运动由地方和部门主动实施，从而造成运动频次过度，因此政府试图收紧群众运动的发动权。

相关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1953年2月，中共中央规定，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任务，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当重视学校教学，督促学校认真执行中央规定的教学计划，不得随意缺课、停课；今后除教育行政部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教育工会或教师联合会，在不妨碍教学工作、不妨碍师生健康的原则下，可以有限制地利用空闲时间，组织师生参与社会活动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一律不得直接动员学校师生参与社会活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这一规定的核心部分便是限制地方和部门发动群众运动的权力。

群众运动是建国初期的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手段，中共依靠它迅速将党的意志落实为国家意志。但随之而来的是各个地方职能部分对群众运动的滥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提出问题解决时，往往会将此现象视为症结。中共中央即曾有如下批评：“许多地方党政机关、青年团和群众团体，不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不经过一定批准手续，不作严格的限制，随意动员教师学生做中心工作、宣传工作以及参加其他校外社会活动，以致常常缺课、停课，大大妨碍了教学工作的进行。”（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但问题在于，中央对群众运动这种治理形式始终保持高度依赖，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之下，各部门随意动员群众运动的问题也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因此群众集会和游行等活动长期处在高频状态，由此产生的问题自然也无法得到根治。

结语

有学者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和制度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源泉。”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执政地位的稳固与群众的人心向背密不可分。群众运动有助于其获得充分的执政合法性。因此群众运动在建国后获得了延续。然而，正如刘少奇所说：“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丛进，1989）群众运动充满能量，一旦过度就会带来伤害。

因此党内并未忽视把握群众运动的度。1961年10月，邓小平曾总结道：“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这里讲的群众运动，是指做好一个中心工作，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是事事搞群众运动，不能天天搞群众运动……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去搞运动。”（邓小平，2014）这一判断体现了党内高层对群众运动的理性认知。

已有的党史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都揭示了群众运动的不可控性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伤害。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种伤害不仅仅发生在“敌我关系”层面，也触及群众运动的参与者自身。一种革命史研究倾向于将参加运动的群众视为“搭便车”的获利者，但本文利用时人的记载展示了历史的另一个维度：过度的群众运动一方面令参与者身心俱惫，危及健康，一方面又将其与学业和工作等日常生活剥离，从而在群众运动内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损耗。中共内部对此久有觉察且三令五申试图纠偏。但历史证明，要根治群众运动过度所造成的伤害和损耗，不是要设法控制运动的度，而是如邓小平的发言所提示的，去寻找其他形式的群众路线。

参考文献

- 〈不忘美蒋匪帮的凌辱！摊贩愤怒参加游行〉，《大公报》，1950年12月17日，2版。
- 〈采取红场大检阅形式，青年界八日大会操，沪东区工人将有四万余人参加游行，并有电力火炬，火龙等节目〉，《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1日，4版。
- 丛进，1989，《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页477。
- 邓小平，2014，《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27。
- 杜文焕、刘德喜，1991，《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页107。
- 〈高低气压相遇形成多雨，天气日内将有转变〉，《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5日，2版。
- 〈各处积水未消，数路电车停驶〉，《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5日，2版。
- 〈各单位参加大游行人数，限明日报指挥部 筹备处今发出通告〉，《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6日，2版。

² 邹谠，2002，《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页152。其他类似观点参见曲青山，2013，〈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前线》，第10期，页49-52；许耀桐，2021，〈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实践与经验〉，《国家治理》，第42期，页3-10；胡锦涛，2021，〈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页11-18；吴爱萍，2023，〈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的百年探索和经验启示〉，《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页234-239。此外，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也对人民群众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有过比较明确的认识。参见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案》（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39；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198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45，等等。

〈工商界筹备联欢大会，大老板表演秧歌合唱，参加游行队伍扩充为三千人〉，《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4日，2版。

〈工商界单独游行，将备客车三百辆〉，《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2日，1版。

〈古老的中国翻了身，六百万市民齐声欢呼——记庆祝开国保卫和平大游行〉，《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9日，1版。

顾颉刚，2011，《顾颉刚日记（1947-1950）》，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页540。

〈华东暨上海各界庆祝国庆纪念筹备会动员指挥部关于各单位参加国庆纪念游行示威的通知〉（1950年9月24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A22-2-29-6。

〈狂欢日记〉，《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5日，2版。

〈跑马厅积水肃清，英法商电车今全部行驶〉，《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7日，2版。

〈商店是否休假，劳资自行协议〉，《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1日，1版。

吴宓，2006，《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第1册，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126。

〈五星红旗插遍大上海，国际歌震撼全世界，五十万人游行示威，大会十二时开始，鸣礼炮举行大检阅，和平鸽万羽凌空，苏侨参加盛会〉，《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8日，1版。

《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2日，2版。

《新民报晚刊》，1950年8月1日，2版。

〈阳光下人民兴高采烈，各区狂欢游行队伍风起云涌〉，《新民晚报》，1949年10月7日，2版。

杨力舟、郅宗远、中国美术馆，2001，《华君武》，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页309。

〈与民众一道，抗美援朝！上海工商界示威大游行，十五万人分四路冒风寒前进，高呼口号，贯彻实行爱国公约〉（1950年12月17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C48-2-2410-178。

〈正午到晚间十时，大会的程序〉，《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8日，1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页272-2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198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64-6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中共中央档选集》，第3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页19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中共中央档选集》，第5册，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3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中共中央档选集》，第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页29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中共中央档选集》，第1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00-10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中共中央档选集》，第5册，页38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4册，页194、54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页279、38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页29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页98。